

太平洋战争时期朝鲜人 资本家的“中国侵略”^{*}

[韩]金仁镐

内容提要 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朝鲜资产阶级处于被统治、从属的地位,具有明显的寄生性、从属性。但是在日本的对外侵略中,朝鲜的资产阶级为了追求经济的扩张,依附于日本侵略者,呈现出一种“第二日本人化”的趋势,成为“侵略战争的前卫队”。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进入中国的朝鲜人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为日本侵略军提供协助,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帮凶,暴露了其露骨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是殖民地时期朝鲜人资本家的特性。

关键词 太平洋战争 朝鲜人资本家 日元经济圈

一 引言

殖民地时代朝鲜人资本家是怎样一个形象呢?在以前的相关研究中,大体是把他们描述为同时受到朝鲜总督府和日本人资本的政治和经济双重掠夺的受害者,资本积累的基础很脆弱,为了生存不得不保持一种隶属的姿态,尽管如此,他们也积极反对垄断资本,这就是占支配地位的所谓民族经济论的观点。^②与此相关,梶村秀树在分析朝鲜民族资本变质为隶属资本过程的研究中,生动

* 本论文的研究由韩国学术振兴财团资助(2003-073-AM1001)。

② [韩]曹基准:《韩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史论》,大旺社1973版;《韩国企业家史》,博英社1973版;《韩国经济史》,日新社1980版,第444页。

地刻画了朝鲜人资本家的形象。^①相反,克服以往历史认识中的“意识形态倾向”(指以民族解放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认识),从新的视角出发研究土地所有和农业经营、劳动和雇佣、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城市形成和人口移动、商品流通和贸易、交通运输、教育等中所体现的朝鲜人资本的能动性、多样性等情况,则属于“殖民地近代化论的观点”。^②

但是仅从这些观点出发似乎并不足以正确说明殖民地时期朝鲜人资本家的历史状况。至少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朝鲜人资本家的动态随着侵略战争的进展,呈现出一种“第二日本人化”的趋势,成为“侵略战争的前卫队”,这一点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即当时众多的朝鲜人资本拒绝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而积极协助日本的侵略战争,帮助日本对周边占领地、殖民地进行掠夺。也就是说,在40年代,朝鲜人资本的历史性质除了特有的寄生性、从属性之外,在朝鲜经济的扩张或对外膨胀的基础上,充分暴露了其露骨的“侵略性”。

关于朝鲜人资本家阶级的“侵略性”的研究成果非常少。池秀杰、李承烈在自己的研究中曾提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形成所谓“满洲之春”和当时朝鲜人资本家进入中国东北的情况^③,关于20世

① [日]梶村秀树:《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朝鲜资本家阶层的对应》,《民族资本于隶属资本》,见《韩国近代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季度。

② Carter J. Eckert, *Offspring of Empir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1.

③ [韩]池秀杰:《30年代前半期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者的‘民族经济建设’战略》,《国史馆论丛》51,1994年。

纪 40 年代朝鲜人资本家的研究,则只有孙科志^①和金仁镐^②的研究。孙科志在再现上海朝鲜人总体的生活面貌的同时,强调了一部分朝鲜人同日本侵略者相勾结,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但是他并没说明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生了这种现象,也没有说明其历史变化状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③

因此,本研究将重点分析在民族经济土壤并不存在的情况下,由于战争的影响,20 世纪 40 年代的朝鲜人资本迅速暴露其对中国露骨的“侵略性”之形态及原因。

二 朝鲜人资本家的“中国侵略”背景

(一) 朝鲜经济地位的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也把以前以日本、伪满洲国、中国关内地区为中心的国土计划扩大到整个“大东亚”地区,于 1942 年 4 月 4 日制订了《国土计划大纲草案》,这是一个推进涉及“日元区”内产业、文化、交通及人口计划、土地等各方面的综合开发计划。为了推进这一综合开发计划,日本组成了“大东亚建设审议会”,确立了明示“确保国防资源及增产 15 年计划”的《大

① 孙科志:《日帝时期上海韩人社会研究》,高丽大学博士论文,1998 年。

② 关于这一点,金仁镐在《日帝的朝鲜工业化政策和朝鲜人资本的动向》(高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 年)中分析了在侵略战争时期朝鲜人资本是如何被日本同化政策所吸收及侵略战争的兵站化动向;在《40 年代朝鲜工业的对外性质和朝鲜人资本的中国侵略》(《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15,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所,2000 年)一文中探讨了朝鲜人资本与日本相勾结向中国渗透的原因;池秀杰在《30 年代前半期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者的“民族经济建设”战略》(《国史馆论丛》51,国史编纂委员会,1994 年)一文中重点探讨了朝鲜人的自立经济论与朝鲜总督府的工业化政策相勾结,转换为亚帝国主义或民族改良主义经济论。

③ 孙科志:《日帝时代上海韩人社会研究》,高丽大学博士论文,1998 年。

东亚经济建设基本方策》(1942年5月14日)。^①在推进这一计划的过程中,东条内阁为了“彰显八紘一宇的精神,综合发挥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力量”,提出了“共荣圈确立3原则”。在这3原则中,阐明了经济划分的必要性和从原来的“以本土为中心扩充生产力”到通过强化“日元区”内各区域的自给力量谋求综合扩充战力的意志。^②

后来,日本修订了“日元区”经济战略。即自给单位不再局限于朝鲜、台湾,而是把“日元区”划分为北边经济地区(以日本为中心的海洋诸岛)、大陆经济地区(朝鲜、伪满洲国、华北、华中)、南部经济地区(台湾、华南、法属印度支那、马来亚、东印度、缅甸)等三个区域^③,把朝鲜、台湾作为兵站基地,建设“经济自给体”。以前的战略是以日本、伪满洲国、华北为中心培育工业,把东南亚作为补给圈,推进综合生产力的扩充。^④换句话说,以前的战略强调的是巩固“日鲜满”区域体制,把朝鲜作为日本本土经济的一部分。但是新的战略把日本本土称为北边经济区,处于中央位置,把北方圈称为大陆经济地区,包括朝鲜、伪满洲国和华北,把朝鲜变成兵站基地,从而打造一条连接日本本土和北方圈的生命线。

那么为什么这种战略修订是不可避免的呢?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要与有着优越生产力和战斗力的英美诸国较量,而其经济现实又使其觉得在这场较量中非常吃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本土经济根本没有能力顾及南方

① [日]山本有造:《“大东亚共荣圈”及其构想》,[日]古屋哲夫编:《近代日本的亚细亚认识》,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6年,第564至565页。

② 《每日新报》1942年5月31日。

③ [日]中村静治:《日本工业论》,金刚社,1943,第323页。

④ [日]商工省总务局:《关于所管事项的行政方针及设施事项》,1941年12月,《日本陆海军省文书》40,韩国出版文化院,1991年版,第29页。

开发和太平洋战争的兵站活动,也没有能力像从前那样详细掌握大陆的状况。^①

这种情况导致日本的“日元区”经济战略发生了很多变化,开始强调朝鲜经济在北方经济圈中的作用。首先,这是因为日本本土由于盟军的空袭,使得生产设备的扩充和对“日元区”的物资供应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北方“日元区”中没有成为战场的朝鲜能够承担日本本土的负担,日本开始诱使朝鲜自发地予以合作,也就是鼓励朝鲜人资本家积极参与战争经济。

对于日本随着南方圈的编入,“东亚共荣圈”进一步扩大,作为大陆前进兵站基地,朝鲜的使命不是宣告终止,反而是进一步加重。太平洋战争后,可以说“大陆吸收了朝鲜”,这样就使日本摆脱了后顾之忧,以全部力量向太平洋进军,这对日本是非常必要的。作为大陆前进的兵站基地,朝鲜的使命更进一步加强。^②

换句话说,这边是“朝鲜吸收了大陆”,即朝鲜成了北方日元区的盟主,但这里暗藏着把朝鲜变成保障生产力的基地的意图。为此,朝鲜总督府提出“通过构筑自给体制,最大程度地减少本地区经济对日本的依赖,提高自给率,在此基础上实现日元区经济的安定”,力图保持殖民地经济的安定,促进生产能力的提高。在“第二次大陆联络会议”或称为“东亚经济朝鲜恳谈会”(1942年9月26日)上,也提出为了保证北方“日元区”的粮食生产和军需工业扩张所需要的原料供给,要增加铁矿石和特殊矿石的生产,扩充水力发电,发展化学工业,并通过这些措施清算对日本本土过度的物资依赖关系。^③

① 《朝鲜产业年报》1943年,第29页。

② 东洋经济新报社:《年刊朝鲜》1942年,第18—19页。

③ 《每日新报》1942年9月27日。

1942年末出版的《朝鲜经济年报》也提出要强调朝鲜在北方“日元区”中的作用。该年报认为如果根据各地现阶段产业开发来看包括国防产业在内的大陆经济自给自足体制的确立的话,只有使各地的有利之处和不利之处间互相补充,才有可能形成有机联系。如果各地仍然保持其政治特性,实行孤立的自给经济,那么对日本(内地)的依赖性会继续存在。举例来说,朝鲜北部的钢铁业要与“东满”生产的粘结炭相结合,而中国东北的各工业也不得不依赖朝鲜的化学药品,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华北。因此大陆经济的综合化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各地的特性,促进其核心产业的发展。^①

实际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朝鲜总督府就大力推进与中国的物资交流。为此,1942年12月17日,在北方经济圈的结合与增加朝鲜和华北的物资交流的名义下,朝鲜总督府举办了“朝鲜华北交易会”,从1943年2月15日到3月4日,先后在大连、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等各地召开了中朝贸易关系官民恳谈会、朝鲜产品展示会等。在与关东州的交流方面,1943年3月5日,在汉城召开了食品贸易恳谈会,4月20日在新义州召开了“鲜满”贸易座谈会,4月21日在汉城召开了大陆联络会议,讨论了促进与北方“日元区”之间的贸易问题。

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朝鲜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与日本的贸易为中心,但是与中国关内地区和伪满洲国的贸易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30年代,朝鲜的贸易一直是处于入超的地位,1932年的贸易逆差为324.8万元,1937年为150.4万元。但是1937

^① 《北方圈の再检讨と朝鲜经济》,《朝鲜经济年报》1941、1942年合刊,第316页。

年以后一直保持着出超的势头。^① 1938 的朝鲜贸易的出口额为 2215.5 万元, 进口额为 1221.7 万元, 顺差为 993.8 万元, 此后一直到 1944 年一直保持着出超, 其中 1944 年的顺差为 846.5 万元。^② 相反, 正如表 1 中所示, 日本本土的北方“日元区”贸易以 1943 年为基点开始为入超, 进口增加率至 1944 年也急剧增加到 199, 朝鲜为 164, 日本较高; 出口增加率朝鲜为 107, 相反日本则为 67, 朝鲜较高, 这种变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说这是本来应由日本承担的对北方“日元区”的物资供应负担被转嫁给朝鲜的结果。

在日本发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 由于自身的需要, 要求朝鲜和伪满洲国在经济上担当起更积极的角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朝鲜人资本家积极开展“侵略中国”。

表 1 朝鲜、日本本土与北方“日元区”(伪满洲国、关东州、中国关内地区)的贸易额 (单位: 万元)

年份	1941		1942		1943		1944	
地区	朝鲜	本土	朝鲜	本土	朝鲜	本土	朝鲜	本土
进口	11277.8	85900	11267.2	122200	18472.2	132200	18544.9	170700
指数	100	100	99	142	164	154	164	199
出口	17327.6	167500	18719.8	151300	18343	129900	18604.7	112200
指数	100	100	108	90	106	78	107	67

(二) 经济侵略的扩散

在太平洋战争前后, 日本为了强化总力战体制, 不仅对朝鲜施

① 就其内容来看, 1940 年出超额为 573 万元, 1943 年的出超额激增至 2941 万元, 1944 年的出超额也有 405 万元。请参照大藏省管理局:《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朝鲜篇) 10~ 11, 高丽书林影印, 1985 年版, 第 48—49 页。

② 该数字系根据《国家别进出口商品额统计表》(《朝鲜经济年报》1948 年, III 第 44 页) 计算得出。

加经济上的高压,而且也向朝鲜人进行思想意识方面的动员,特别强调同为“东洋人”的感情。如总督训示说:

作为帝国来讲,现在的战争真的是为了自尊自卫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正义战争。正像天皇的诏书中所表示的那样,我们国家绝不是原来就喜欢战争的国家。只是为了确立世界和平。日清、日俄战争和最近的满洲事变、日中战争也终归是以这种肇国的伟大理想为基础,使东亚成为和平的东洋人的东洋。^①

也就是说,日本的侵略战争被美化为是为了自尊自卫的“圣战”,是“正义的战争,是肇国的理想”,残酷的经济掠夺也被宣传为摆脱欧美国家原料商品市场、建立大东亚自主经济所需要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反西欧帝国主义的自力更生”、“克服自由主义经济的矛盾”等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亲日的朝鲜人资本家不仅全盘接受了这种侵略思想意识,而且在日本这种侵略逻辑之上加上了殖民地人的劣等意识,使这种侵略逻辑更加疯狂。三千里杂志社的社长金东焕说道:“皇军将士有11万名战死,朝鲜人才只死了3名,国债消化的力量也不如本土的任何一个县,因此统一国民精神,献出(我们的)努力、物资和金钱,再之后准备在战场上牺牲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以皇军将士为榜样,到战场上去,我们国家必须保卫日本帝国。”^② 号召不仅要献出物资,而且为了日本要勇于献出自己的生

① 《总督在临时中书院会议上的训示》,1942年12月10日,见《太平洋战争下的朝鲜》1,第63页。这种把战争美化为是为了东洋人的和平其实就是露骨地推进的战争宣传逻辑。举例来说,朝鲜总督在1940年9月16日的临时道知事会议上做的训示把中日战争描述为为了东洋人和平的神圣战争,太平洋战争也被规定为圣战(《殖银调查月报》1940年12月,第64页)。

② [韩]金东焕:《在临战报国团结之际》,《三千里》1941年11月,第16—17页。

命。这表明,朝鲜人资本家认为自己已经积极参加侵略战争,日本本土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也已经绑在了一起,也就是说朝鲜人资本家的认识已转变为所谓的“一体的共荣圈论”、“第二日本化论”、“侵略战争同伴论”。朝鲜人资本积极进出海外就反映了这种认识上的变化,而每年召开的全朝鲜工业者大会所提出的议案内容也充分说明了这种变化。

表2 第六次全朝鲜工业者大会(1939年9月)主要议案

议案内容	提出议案的团体
培育中小工业	釜山工业俱乐部
培育各种附属工业	朝鲜工业协会
朝鲜内工厂地方分散化	大邱工业协会、海州商会
培养、配置工业经营指导者和工业技术者	平壤工业俱乐部、咸兴铁工业协会、工业协会

出处:《殖银调查月报》,1939年11月号,第138页。

表3 第七次全朝鲜工业者大会
(1940年10月)主要议案

议案内容	提出议案的团体
培育中小工业	朝鲜工业协会、元山商会
为了小工业的组织化制定小行业协会制度	大邱工业协会
制定适当的劳动动员计划和劳务调整	朝鲜工业协会、釜山工业俱乐部
制定综合的国土开发计划	朝鲜工业协会
设立科学研究所	平壤工业俱乐部、咸兴铁工业协会、工业协会
在朝鲜北部设立工业高中	咸兴商会
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全国均衡配置	咸兴及元山铁工业协会
动力收费单一化	元山电动力需要者协会

议案内容	提出议案的团体
设定适当的工业品价格	釜山工业俱乐部
综合配给原材料	同上
产品规格单一化	同上
一元制统制朝鲜工业	釜山工业俱乐部
追加事项	
在朝鲜设立针织工厂	南鲜贸易(株式会社)
积极推动工厂搬迁和原材料的配给	清津商会、咸北造船业协会

出处:《殖银调查月报》,1940年12月号。

表4 第九次全朝鲜工业者大会
(1943年9月)主要议案

朝鲜内自给力强化	海外进出
提议在朝鲜设立铁工业培育机构(工业协会)	希望朝鲜增加生产出口产品(工业协会)
在朝鲜实现小型钢集中型钢的自给计划(仁川工协)	中国关内地区、伪满洲国方面简化朝鲜产品出口手续(仁川工业协会)
制订关于民间利用(釜山工业俱乐部)敌产的工业选址的基本政策	希望确保南方资源输入朝鲜(釜山工业俱乐部)
促进实施工厂用一般电力收费统制(群山商会)	希望北方的重工业化取得进展(咸兴商会)
扩充农作试验研究所,增加粮食产量(群山工业俱乐部)	希望多狮岛港竣工(新义州商会)
使用无烟煤开发火力发电(元山商会)	希望计划扩建港口(新义州商会)
内地中小企业搬迁至朝鲜(新义州商会)	

出处:《殖银调查月报》,1943年11月号,第26至28页。

与第六次大会提出的通过与日本本土的联系增强中小企业、非军需产业;第七次大会中提出的强调培育小的行业协会、适当的劳动动员计划、综合的国土开发计划不同,在太平洋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召开的第九次大会上,朝鲜人资本家则提出的把朝鲜

建设成为“日元区的生产力基地”。这从工业协会重点提出强调增加出口商品的生产、简化朝鲜产品的出口手续、希望北方圈的重工业化取得进展等主要与海外贸易和海外进出等有关的议案也可以得到证明。在以前的研究中，一直强调 40 年代的朝鲜经济是兵站基地，认为朝鲜的工业是提供或转包与军需相关的产品工业化，而实际上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特别强调的是军需品之外的消费品及各种维持“日元区”所需要的产品的出口。这在对伪满洲国和中国关内地区的出口增加在表 1 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一点从 40 年代食品成品和工业成品对日出口的扩大也可以得到确认。^①

在表 4 中，明显不同的是，与北方圈有着经济联系的仁川、咸兴、新义州商会主要讨论的是与北方圈的贸易关系或重工业的进展问题，相反，釜山工业俱乐部主要强调的是确保南方资源的输入和敌产利用问题。这反映了主要利用南方原料的釜山地区和以北方圈为市场的咸兴、仁川地区在基本的经济认识上所存在的差异。

这种对外进出的欲望从理论上来讲是被所谓的 1 次共荣圈论、北方圈的扩张论、战争同伴论等武装起来的。当时殖产银行调查部的金承范说道：

南方资源丰富，由于一般的企业集中开发南方，所以就有人认为北方的资源即朝鲜的资源其开发的價值就会减小。也就是说，由于被称为南方乌克兰的佛印（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缅甸等的大米产量有很大的出口能力而否认朝鲜产米增殖计划的重要性，由于马来半岛、荷印（荷属东印度）、菲律宾等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所以北方的矿业特别是朝鲜的矿业就没有开发的價值，而依靠这种资源的朝鲜工业其未来也很

^① 朝鲜银行调查部：《朝鲜经济年报》（1948）III第 50—51 页；请参照金仁镐：《太平洋战争时期朝鲜工业研究》，汉城新书苑，1998 年版，第 108 页。

渺茫。其实这不仅是没有能正确认识南方资源的内容及其性质,没有理解大东亚战争的经济意义,而且是没有能理解北方圈在东亚共荣圈中的位置如何、在北方圈中朝鲜的地位特别是朝鲜工业的作用如何的极其浅薄和极其危险的想法。南方圈加入共荣圈决不是与北方圈对立,而是与北方圈互通有无,形成完整的自给自足的东亚共荣圈,在这一点上南方圈的加入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北方圈作为第1次共荣圈成为共荣圈的中心,负有在自主的立场上培养南方圈的新责任,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①

他所提出的“北方圈作为‘第1次共荣圈’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中心,在自主的立场上被赋予培养东南亚圈的新责任意义非常重大”是出于同一逻辑。这也是与“大东亚国土计划”以后日本要把朝鲜建设成为北方日元区的“重要物资的自给基地”、“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基地”的逻辑相对应。这种“第1次共荣圈论”通过官办杂志、舆论以“朝鲜为北方圈的组长”^②被宣传和扩散,特别是40年代以后作为朝鲜人资本家参加侵略战争的逻辑归宿而深受欢迎。这种认识在朝鲜工作株式会社社长在该会社创立时发表的创建演说中充分地表露了出来。

现在支那事变(中日战争)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为了进行第三期作战,对付血的长期抗战,更加需要扩充军需物资的制造,我朝鲜作为大陆的一部分,从地理上来说与满洲国、北地(华北)相接,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必须适应对各种

① 金承范:《北方建设和朝鲜工业》,《朝光》1942年4月号;《殖民地时代资料丛书》第6卷,第564页。

② 东洋经济新报社:《朝鲜产业年报》1943年,在第28页的序言《决战体制的确立和朝鲜经济的再改造》中把日本、朝鲜和北方诸地区在侵略动员上的位置分别比喻为邻组或爱国班组织。朝鲜就处于大陆邻组组长的位置。

机械类产品的众多需求。不论是战时还是平时,今后我们朝鲜所承诺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吾人作为忠厚的国民,要以坚实的创造强化战时体制……在战时要为帝国战斗力的扩充、强化贡献力量,在平时要为重大产业的振兴发展做出贡献。^①

按照他的逻辑,侵略战争就成了自己进行资本积累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点,他表现出积极参与扩充生产力的意志。^②一部分朝鲜人资本家把日本的侵略战争看作是进行资本积累的绝好机会,当时京城纺织社长金季洙在回忆那种沸腾的兴奋时说道:

日本军以破竹之势占领上海、南京等地之后,这些地方中国人经营的纺织工厂几乎处于关门状态,因此纺织品的匮乏日益严重。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满洲很受欢迎的不老草漂白粗布也随之向华北一带扩张势力,京城纺织也随之得以迅速发展。这是由于中国人拒绝使用敌对国家日本的产品而发生的现象。在这意想不到的国际舞台上,从受到欢迎开始,京城纺织在生产上快马加鞭,迎来了繁荣的时机。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况发展的话,京城纺织现在已不再是韩国的京城纺织,要发展成为东洋的京城纺织也为时不远。^③

1936年,金季洙为了进入中国东北,在奉天举行了“满洲三养社”揭牌仪式,正式开始在中国东北拓展事业。在这里设立了天一农场、磐石农场、胶河农场、梅河农场、沟台农场等,安置朝鲜农民。1939年,进一步在奉天近郊的苏家屯设立“南满纺织”,1939年12月16日在京城召开了创建大会(资本额1000万元)。1940年开

① 《三千里》1939年4月,第44页。

② 《每日新报》1942年1月18日,《经济人的决战姿态》7。

③ 韩国日报社:《财界回顾》1(元老企业人第1篇),1981年版,第94页。

工建设 27 万坪(1 坪相当于 3.3 平方米)的工厂,1942 年完工,1943 年开始投入生产。该公司拥有纺机 35000 台,织机 1000 台,工人有 2000 名。^①从京城纺织短期的纯利润来看,1936 年只有 6 至 7 万元,1939 年达到 63.6783 万元,1945 年更增加到 100.3 万元。^②固定资产在 1934 年只不过有 30 万元,1943 年达 1173 万元,增加了 43 倍。创建时资本额只有 25 万元,至 1943 年为 1000 万元,1945 年竟达 1300 万元。可以说,朝鲜人资本家亲身体会到了中日战争给其资本的增加带来了实际的利益。

表 5 进入中国东北或与之相关的主要朝鲜人资本

公司名称	代表人	创建时间	主要事业	资本额
东方殖产株式会社	闵奎植	?	在东北的殖产事业	?
三星商会	李秉喆	1938.3	创建于大邱的仁桥洞,向中国东北和关内地区出口苹果、栗子和鱿鱼等干鱼类	?
南满纺织	金季洙	1939	京城纺织的海外分公司	1000 万元
和信贸易	朴兴植	1939.4	与天津、东南亚的贸易	275 万元
朝鲜飞机	朴兴植	1944.10	利用中国关内地区的原材料、东北地区的飞机技术和日本的零部件组装飞机	5000 万元 (2500 万元交付)

像闵奎植的东方殖产株式会社、^③李秉喆的三星商会、^④朴

① 京城纺织株式会社:《京纺 70 年史》,1989 年版,第 107—111 页。

② 同上书,第 120 页。

③ 《三千里》1940 年 6 月,第 70 页。

④ 第一制糖株式会社:《第一制糖四十年史》,1993 版,第 111—112 页。

兴植的和信贸易^①等也紧跟日本侵略政策的步伐,积极进入伪满洲国和中国关内地区等。由朴兴植主导设立的朝鲜飞机工业株式会社计划接受伪满洲国的飞机工业技术的转让,把日本中岛飞机制造所生产的零部件组装起来,生产飞机。

三 朝鲜人资本家“侵略中国”的具体事例

(一) 中国境内朝鲜人的动向

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朝鲜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朝鲜人也开始大批移住中国。在中日战争之前,上海、南京、汉口等地的朝鲜人有568户,2281名。但是到1941年末为止,居住在华北的朝鲜人有72076名,华中为11319名,华南为1490名,总计84885名。^②至1944年为止,华北地区居住的朝鲜人有19359户65808人。^③如果推算1945年中国境内(伪满洲国除外)的朝鲜人人数,至1947年从中国归国的总共有58143人,留在当地有2000名,从这个记录来看,当时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应在60143名以上。^④

① 《东亚日报》1939年4月11日;[韩]吴天锡:《南洋行》1~6,《朝光》1941年2月至7月;[韩]柳承寅:《东南亚贸易行脚记》,《东京被火烧时》,大成文化社1973版。

② [日]大藏省管理局:《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通卷第1册总论,第1册第3章,高丽书林影印,1985年,第225页。

③ 《第86回朝鲜总督府帝国会议说明资料(10)》1944年12月,不二出版社1994版,第8页。

④ 朝鲜银行调查部:《朝鲜经济年报》1948年,1,第11页。

表6 太平洋战争时期在中国朝鲜人人口动向

(单位:名)

区分	1941年末	1942年7月	1944年末	解放之后(韩国)
华北	72076	-	65808	-
华中	11319	11054	* 13597	-
华南	1490	-	-	-
总计	84885	-	79405(+)	* * 60413

* 仅包括上海、汉口、南京地区。* * 包括解放后1947年12月31日为止回到韩国的人数和留在当地的人数。

特别是华中地区,截止到1942年7月有11054名,1944年前后南京、汉口、上海地区的朝鲜人的人数为4765户13597名。^①其中就上海地区的朝鲜人的动向来看,至1936年为止朝鲜人有1797名,至1938年一跃增加为3138名。^②1941年实际居住在上海的朝鲜人约有4000名,但根据上海朝鲜人居留民会的登记,大约有7000至8000名曾在居留民会登记。^③当时居住在南京的朝鲜人约有1000名。

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华北地区的朝鲜人呈减少之势,华中地区的朝鲜人却在不断地增加。那么这两个地区人口动向不同的原因何在呢?对于华北地区朝鲜人的减少,朝鲜总督府曾作了如下的说明:

1943年华北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物价飞涨,造成了生活的困难,总领事馆也根据国策整顿企业、对地区进行再编,由于这些

① 前引《第86次朝鲜总督府帝国议会说明资料(10)》,第8页。

② 前引孙科志之博士论文,第47页。

③ 朴启周:《与上海时报总经理崔敬洙谈上海的朝鲜问题》,《三千里》第13卷第4号,1941年4月1号,第132页。

原因,从1944年春天开始出现了大批朝鲜人从内地向其他地方移居者,从1月到4月,朝鲜人3387名中有307名到了“满洲国”。^①

也就是说,由于战争造成企业整顿和物价飞涨等经济的不稳定,1944年以后,华北地区的朝鲜人出现了减少的趋势。换句话说,朝鲜人人口减少的原因是由于朝鲜人资本家和自营业者等经济人口出现了变动。

随着朝鲜人移居中国,朝鲜银行券的海外发券量也迅速增加。仅就朝鲜银行券的增发规模来看,截至1944年末为31亿4千万元。据调查,到1945年8月14日为止,又增加了17亿,达48亿4千万元。到1945年末已经达到87亿6千万元。中日战争以后,朝鲜银行券随着进入中国等营业地区的扩大,海外发行额剧增,占1937年末朝鲜银行券发行额的31%、1945年末的40%。^②朝鲜银行券的扩散成为明里、暗里支持朝鲜人资本家渗透的催化剂。

(二) 中国境内朝鲜人资本家的动向

在日本帝国主义修订日元区经济战略和朝鲜资本家中侵略同伴逻辑扩散的背景下,一部分朝鲜人资本家利用这种侵略战争,在日本的占领地开办各种企业和营业店铺。当然在这之前也有很多朝鲜人移居中国谋生。截至30年代为止,上海的朝鲜人开设的企业涉及了医疗、人参、杂货、布匹、洋酒、照相、渔业、农业、理发、糖果贩卖等行业。这些企业多数为个人企业,也有一些小企业家以自营业者的形态来到上海,这些企业合起来有40余个。^③

但是当时任上海时报总经理的崔敬洙曾说,在中日战争之前,“居住在上海的同胞可以分为两种,其中商人达300余名,居住在

① 前引《第86次朝鲜总督府帝国议会说明资料(10)》,第8页。

② 朝鲜银行调查部:《朝鲜经济年报》1948年,III第66页。

③ 前引孙科志之博士论文,第103页。

外国租界的思想客有 200 余名”。^①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上海韩人中,有与日本资本勾结积累财富的商人集团,也有居住在外国租界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者,他们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中玉观彬和金科奉一方面从事民族解放运动,一方面经营着企业和学校。

在上海由同胞经营的机关有仁成学校,由金科奉全面负责经营。同胞的人数大约有六、七百名,都拥有职业,与以前一样生活都不困难,据说玉观彬积累了 50 万元的资金,金科奉也有数十万元。这次上海事变并没有对同胞产生直接影响,但是由于红参由日本人的三井经营,由于受反日的影响,销售情况不好,松高纺织每年销售 3 万元计划受到打击。在通信方面,由于邮件都要经由日本,常出现延迟的情况。居住在法租界的朝鲜人有违反日本法律的,但是由于居住在租界,日本军队也无法干预,因此与在满洲的朝鲜人相比,比较安心。^②

但是中日战争之后,情况就大为不同。就像(表 7)中所显示的那样,截止到 1939 年,在上海地区,除了钢铁、贸易、精密机械修理、钢笔、杂货、食品等之外,也存在着不少利用战争条件设立的舞厅、餐馆、慰安所、贸易等企业。但是经营慰安所的朝鲜人资本家都与日本的驻外机构、情报机构、甚至是军方有着密切的关系。像在上海经营慰安所的朴日硕就是亲日的上海朝鲜人亲友会的成员,而这一机构得到了日本外务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朝鲜总督府等的支持。^③除此之外,在战争中利用日本的庇护,也有不少朝鲜人开拓新的经营领域。

① [韩]朴启周:《与上海时报总经理崔敬洙谈上海的朝鲜问题》,《三千里》第 13 卷第 4 号,1941 年 4 月 1 号,第 132 页。

② [韩]柳光烈:《上海和朝鲜人》,《东光》31,1932 年 3 月 5 日,第 19 页。

③ 孙科志:《上海韩人社会史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8 页。

中国中南部(上海、南京、汉口)方面的朝鲜人的职业有小商人、店员、电车查票员、从事禁止商品走私等,他们的生活已经好转。中日战争之后,军队翻译、汽车司机、慰安所经营者和批发商人增多。随着占领地区的扩大,也有朝鲜人进入偏远地方的经营贸易、饮食店、交通运输业等各领域,当地的机关也正在考虑清除从事走私等不正当行业的朝鲜人。^①

表7 1939年上海地区主要朝鲜人企业

(单位:万元)

姓名	公司名称	经营种类	资本额	姓名	公司名称	经营种类	资本额
奉在龙	三河兴业	钢铁	40	李泰铉		贸易	3
金亨植	三德洋行	制药	8	安俊生		同上	3
张斗彻	半岛贸易公司	贸易	5	金昌华		?	3
孙昌植	东海洋行	精密机械修理	3	林承业	林盛公司	?	3
金守仁	文记工艺厂	钢笔	2	朴东彦		贸易	?
白利淳		杂货、洋货	5	韦惠林		同上	?
金河钟		同上	2	朴日硕		慰安所	3
桂春建		同上	3	金一准		同上	2
金尚用		贸易	3	李昌祚		同上	2
金家仁		同上	2	李相佑		同上	2
崔永泽		同上	20	李致云		同上	2

① 前引《第86次朝鲜总督府帝国议会说明资料(10)》,第8页。

姓名	公司名称	经营种类	资本额	姓名	公司名称	经营种类	资本额
韩奎荣		同上	3	宋世浩	极东舞厅	舞厅	2

出处：杨昭全编：《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韩国论文资料院 1987 年版，第 95 至 96 页；《上海に於ける九千同胞の活跃を見る》，《三千里》1943 年 3 月，第 96 至 109 页。

这些朝鲜人企业资本额平均只有 2 至 3 万元，属于规模比较小的个人企业。特别是随着战争的发展，朝鲜人经营的慰安所迅速增加，从资金规模来看，与一般企业相似，为 2 至 3 万元，可以看出，朝鲜人资本家是有组织地大规模经营着慰安所。

这种情况在南京更为严重，有资料显示，1941 年居住在南京的朝鲜人大部分经营着慰安所。当时三千里社的华中特派员朴启周曾问上海时报的崔敬洙，“南京的 1000 余名同胞大体上从事什么职业”，崔回答道，“说出来很羞耻，大部分经营着慰安所即游乐业”。^① 这说明当时的朝鲜人参与了慰安所的经营。

1940 年南京汪伪政权建立之后，上海、南京等地的多数朝鲜人资本家利用这种机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相当规模的资本和技术向中国渗透。^② 关于向中国渗透的朝鲜人资本，大东亚社（三千里社）的华中特派员朴巨影描述道：

在上海，我们半岛同胞在各领域活跃的事例也不少。把办公室设在大型的公寓中，雇用数十名外国人为职员，利用数百万元的融通资本设立的公司，实际上在响应国策，在产业经

① [韩] 朴启周：《与上海时报总经理崔敬洙谈上海的朝鲜问题》，《三千里》第 13 卷第 4 号，1941 年 4 月 1 号，第 132 页。

② 根据 1942 年 7 月为止的日本外务省调查，仅华中地区主要城市居住的朝鲜人就有 11054 名。日本大藏省管理局：《关于日本人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通卷第 27 册，中南支篇第 1 分册，第 98 页。

济方面取得了伟大的业绩。看到这一点真令人高兴。^①

可以看出,与以前相比,向中国渗透的朝鲜人企业在资金和劳动力方面,其规模迅速扩大,也有的企业拥有数百万元的资本。但是在其充满兴奋之情的感叹中,关于像南京那样靠经营慰安所积累财富的朝鲜人的内容却被略去了。

1943年前后,在中国的南京、上海、苏州、无锡等地活动的朝鲜人资本家如(表8)。

表8 中国上海、南京地区主要朝鲜人资本家(1943年)

经营者	籍贯	公司名称	位置	设立年份	经营内容
奉命石	平壤	三河兴业(株)	上海	?	铝、食品、纺织品等贸易(资本70万元),铁工业(资本100万元),分公司10个
林承业	平壤	京华产业		1941	与中国企业家合资经营精密机械、出租车业,韩国与华中、华南之间的贸易。
朴东彦	?	永和贸易公司		1935	火柴工厂(万元)、煤矿(50万元)、纺织品(数十万元)等。
金亨植	牙山	佛慈药厂		1935	制药,有500家分店,战争后尚有200家分店。
韦惠林		惠新洋行		1931	向美国和日本出口生丝、茶等。
崔永泽	宣川	永华贸易公司		1924	销售印度产绸缎、特产品贸易
李泰铉	?	大利洋行		1929	根据兴亚院的指示,积极参加“大东亚建设工作”,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辛锡福	?	东兴会社		1941	总公司有资本100万元,在上海有金贞基(专务)负责。

① [韩]朴巨影:《苏州、无锡、南京の朝鲜财界人の活动を見る》,《三千里》1943年3月,第106页。朴为当时大东亚社驻中国特派员。

经营者	籍贯	公司名称	位置	设立年份	经营内容
李东旭	义州	远东公司	南京	1934	在天津从事贸易,在南京1939年开业。
柳本寿永	?	福记洋行 南京分店		?	资本20万元,职员100名,南京米谷协会干事,南京啤酒协会会长
李致显	延白	德盛泰公司		1939	贸易
梁桂俊	义州	荣昌公司		1936	在济南和青岛经营大厂公司,1938年开设荣昌公司
金仁湖	泰川	维新当洋行		1938	典当、印刷业
林光正	平壤	林工务所		1939	平壤工业学校毕业,在中国促进日中合作社事业,参与土木建筑业。
秦繁	?	伊藤运输公司		1938	偏远地方的物资运输
张永福	?	三福屋洋行		1939	农产品经营,军国观念不强
金村壬石	定州	三大洋行		1939	1939年移居,经营大农场,后扩展到铁工厂、碾米业。
山田启男	宣川	南京衣被工厂		?	军方指定工厂(资本15万元),中国工人100名,缝纫机500台
安田慎吾	和顺	大京公司	苏州	1937	1937年移居,资本30万元,中日合作社,土特产、偏远地方贸易
金守仁	?	金家公司		?	具体内容不详
金井勇	?	中支产业社		?	具体内容不详
江鳩命	?	三河兴业分公司		?	三河兴业分公司
林辉三	?	广信洋行		?	具体内容不详
吉田	?	兴源公司		?	具体内容不详
国本	?	复兴公司		?	具体内容不详
远山	?	苏州洋行		?	具体内容不详

经营者	籍贯	公司名称	位置	设立年份	经营内容
花村 朴赞彬	? ?	三和洋行 长江精米 所	无锡	? ?	具体内容不详 和朝鲜的碾米业者大山合作, 年产 36 吨, 经营草绳工厂

出处:《上海に於ける九千同胞の活跃を見る》、《南京实业家の群像》、《苏州、无锡、南京の朝鲜财界人の活动を見る》、《三千里》1943年3月,第96至109页;《光化》1941年11月。

可以看出,上海、南京地区的朝鲜人资本家的移居时期为1935至1936年和1938至1939年,正值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后。就其出生地区来看,大部分是出生于平壤、定州、泰川、宣川、义州等朝鲜西部地区,这与40年代以后朝鲜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正在紧张地进行的情况是一致的。同时他们扩大“中日合作事业”,从政治上来说积极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工作”,对中国的财界和政界发挥影响力,成为典型的侵略战争“前卫队”。

但是,40年代日本对经营小规模的个人工商业而移居中国的朝鲜人小资本家采取了彻底的压制政策。1941年,当时上海时报的崔敬洙在说明新设立商业企业的情况时说,基本上处于“不允许开业的状况,以前的商业协会也不允许开业”。^①可以说日本帝国主义在为与日本侵略势力勾结的朝鲜人资本的快速发展提供支持的同时,对小规模的生计型朝鲜人资本进入中国实行彻底的封锁政策。

从进入中国的朝鲜人资本家的各自面目大体上可以了解其资本积累状况。以林承业的企业为例,1939年设立林盛公司(资本额3万元),主要生产杂货、洋货。1941年他与中国的企业家合作,设立京华产业,促进朝鲜与中国中南部的贸易。这时已经拥有

① [韩]朴启周:《与上海时报总经理崔敬洙谈上海的朝鲜问题》,《三千里》第13卷第4号,1941年4月1号,第132页。

火柴工厂(资本额 25 万元)、煤矿(资本额 50 万元)、纺织品(数十万元)等约 100 万元的资本。从当时的记录来看,他的企业属于“准国策公司”,也正因为如此,京华实业在创建时得到朝鲜总督府事务官原田一郎的积极支持。^① 1943 年,他又和中国企业家合作,进入碾米、出租车行业。李泰铉则在 1939 年以 3 万元的资本从事小规模贸易,但是到了 1943 年,它作为大利洋行的最大股东,实际上负责着公司的经营,成为能够动用数十万元资本的财阀。特别是和日本的兴亚院相勾结,积极参与建设工作,成为在当地具有强大政治影响力的企业家。这从 1943 年《三千里》刊载的介绍他的内容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

向大家介绍与实业界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在日中合作的巨大政治舞台上积极推动各项工作的李泰铉。1929 年他来到上海以后,成为大利洋行等大型公司的中坚人物,可以动员数十万元的资金,更重要的事,在建设大东亚的工作中,作为热血男儿,他正在 OOO 和兴亚院的指示下,为工作而东奔西走。^②

柳寿泳(柳本寿泳)从三菱财阀处获得金融资本,作为福记洋行南京分公司的负责人,从事米谷和食品业,成为日本财阀资本向该地区渗透的尖兵。金仁湖最初只有 5000 元的资本,与日本的财阀资本勾结,从事典当业和印刷业,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山田启男的衣被工厂被指定为军需工厂,有 100 名的中国工人,缝纫机也有 500 台,在与侵略战争相关的产业领域积累了巨额的财富。金亨植在 1935 年设立了三德洋行,从事制药行业,1939 年其资本达 8 万元。到 1943 年,其拥有佛慈药厂,在中国各地拥有约 500 个销

① 《当地产业界的巨头》1,《光化》1941 年 11 月号(上海光化社),第 7 页。

② 《上海に於ける九千同胞の活跃を見る》,《三千里》1943 年 3 月,第 100 页。

售点,成为大规模的制药公司。奉在龙 1939 年以 40 万元资本创办的从事钢铁业的三河兴业株式会社到 1943 年由其亲属奉命石经营,其铁工厂的资本已经超过 100 万元,有 10 个分公司,成为一个大型公司,除此之外,在铝、纺织品贸易方面也投资约 70 万元。在约 4 年的时间里,其资本从 40 万元增加到 170 万元,增加了 4 倍。

进入中国的朝鲜人资本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合作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的行动,这从上海鸡林会等团体可以看出。上海鸡林会的顾问有上海(日本)居留民团长、大使馆警务部第二课课长、上海总领事馆行政部长、朝鲜总督府派遣事务官、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长,评议员有金泽秀雄、靖原甲宁、孙田昌植,理事长为江鸿命石(原名奉命石,为三河兴业的总经理),副理事长为金海河钟。^①担任文化部长的平田在福为兴亚院文化局的重要成员。从这一事实来看,上海的朝鲜人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有着极深的关系。

朝鲜人的这种组织并不是仅存在于上海。根据朝鲜总督府向帝国议会提出的说明材料称,仅在华北地区,“从 1941 年春开始在各地设立协励会,到 1944 年已发展到 43 个,这些团体正在展开强大的皇民化运动,大东亚战争已爆发,他们和居住在各地的日本人

^① 上海鸡林会的理事有金海河钟、平田在福、村井惠、江鸿命石、玄谷正柱、高岛辉三、南宫赫、松村元雄、方由老元、入部俊夫、坪井盘松、林承业、韩田奎光、金株龙河、崔金元庆等 15 名。总务部长为松村元雄,鍊成部长为玄谷正柱,文化部长为平田在福,厚生部长为金城龙河,书记长为岩本秀夫。总务部委员有石川清吉、清由靖三、文清钟锅、山平景生、片山在浚、大山启治、清木秀夫,清成部委员有南一诚、西原泰熙、清奇锡、洪鱼吉、伊藤大辅、方由宣弘、月山,文化部委员有金田明水、宇岛崇夫、朴巨影、柳用有吉、南宫尧、和田宗、金谷炳道,厚生部委员有柳义卓、吉田光庄、广木清、大丘正雄、长谷用美宰、木村建宰、桂春舞等(《上海鸡林会阵容—唯一的半岛人团体》,《大东亚》第 15 卷第 3 号,1943 年 3 月 1 日,第 99 页)。

一道,以热烈的赤诚开展必胜祈祷,召开各种与时局相关的大会,购买国债,回收金属,飞机和武器的献纳,国防献金等各种爱国运动”。^①在蒙疆地区也建立了“协励会”,开展同样的活动。

四 结论

由于太平洋战争,日本修订了原来的“日元区”经济战略。在必须与处于生产力优势的英美诸国进行较量的处境下,为了进行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迫切需要扩大殖民地和被占领地区自发的协作和物资动员能力。作为其中的一环,把“日元区”从原来的日-伪满-中国扩大到东南亚,同时把朝鲜工业改造成“北方日元区的补给窗口或物资动员基地”,朝鲜人资本也积极地进入海外。在了解了资本积累的可能性之后,深受鼓舞的朝鲜人资本家积极进入伪满洲国和中国关内地区。例如从京城纺织的“南满棉业”、三星的朝鲜与伪满洲国的贸易以及中国其他地区如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的100余个企业主出身地区、企业创办时间和经营的领域来看,不能说他们是“自然移居”,而是利用侵略战争移居的。一旦得到许可的朝鲜人企业挤入日本帝国主义促进的“日元区”自给政策之列,其资本就能快速地增殖。虽然他们也进入了钢铁、制药、贸易、精密机械修理、钢笔、杂货、食品等行业,但更多的是积极进入慰安所、舞厅、餐馆等非生产性的消费行业,获得极高的收益。但是正像自由商业所绝对不允许的那样,这些企业活动都是在日本的严密统制下进行的。

这些朝鲜人资本设立各种组织如鸡林会、协励会等与兴亚院、特务工作队或领事馆、财阀分公司等保持密切的关系,不是仅从事

^① 前引《第86次朝鲜总督府帝国议会说明资料(10)》,第8页。

单纯的经济活动,还积极参与“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工作”,发挥着政治影响力。20世纪40年代朝鲜人资本家阶级利用侵略战争,积极进入中国,参与慰安所等娱乐消费产业,获得了巨额的暴利。也就是说,对当时的朝鲜人资本家来说,侵略战争是培育其资本的温床,他们则成为侵略战争的“前卫队”。

(作者金仁镐,韩国牧同大学历史学科教授)

(责任编辑:刘 兵)